

評介倪文孫《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一七三八)

一九八〇(一)期

\*黃克武

書名: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ieh-cheng (1738-1801)*  
作者: David S. Nivison  
出版: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頁數: 322 pp.

章學誠是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位奇才，生前沒沒無聞、窮困潦倒，死後才逐漸地受人重視，余英時先生甚至譽之為「中國三千年來唯一的歷史哲學家」。他有許多超越時代的特殊見解，因此直到目前，章氏深邃的思想對學術界而言仍具有高度的吸引力。

倪文孫的著作在章學誠研究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雖然該書出版至今已將近二十年，但是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於章學誠的研究仍有參考的價值，因此我們不揣謏陋撰此評介。然而如果我們要從近二十年來學術研究成果的標準來批評此書，這種批評必然不够公允，因此我們嘗試將此書置於學術史的背景之中來觀察，希望能較客觀地呈現此書的成就與限制。下面我們首先介紹有關章學誠研究的重要成果，接著談到倪著中主要見解，最後則提出我們對這本書的看法。

在章學誠死後的一百零一年，西元一九〇一年，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開始對章學誠產生興趣。他利用一部抄本《章氏遺書》，首度完成「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文，一九二〇年發表於《支那學》第一卷三至四號，這是章學誠研究的開山之作。胡適先生讀了這篇由日本學者寫成的文章之後深感慚愧，因此對照浙江圖書館出版的《章氏遺書》，訂正內藤上文之中錯誤及遺漏處，另作了一本新的年譜，這本年譜後又經姚名達先生訂補，在一九二八年出版。此書將年譜的體裁擴大到學術思想的研究，不但在體例上是一大創新，而且為章學誠的學術研究立下初步的規模。

一九三七年錢穆先生將九一八事變以來在北大教書時所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講義付印出版，其中第九章對章氏的思想有深刻的分析，特別指出章氏《文史通義》為針砭當時經學之流弊而作，道不在六經而在人倫日用之中。錢穆這篇文章最重要的貢獻是從清代學術演變之中闡明章氏思想的意義，該文對倪文孫和余英時都有很大的影響。

一九四四年侯外廬出版《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其中第八章為「繼承清初文化傳統底文化史學家章學誠」，侯文一方面指出了章氏為「文化史學家」，另一方面則對章氏學術思想的淵源提出了一些見解。

一九六一年法國學者戴密微 (P. Demieville) 在蒲立本 (E. G. Pulleyblank) 所編之《

中日史學家▽中撰寫「章學誠及其史學」一文，章氏開始受到西方學術界的注意，倪文孫對章學誠的研究與此文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六六年倪氏所著《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出版。

一九七七年余英時撰《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此書透過戴震與章學誠的交互影響，從心理史學的觀點提出章氏所承受之「考證壓力」，並將全文置之於宋明以來知識主義之興起的內在理路來分析章氏的思想。

以上我們簡單地對章學誠的研究作一學術史的回顧，由此我們可以較清楚地了解倪著在整個學術傳承上的地位。

倪文孫一九二三年生，一九五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為《章學誠的文學和歷史思想：他的生平與著作之研究》▽，改寫之後即為本書。一九六六年起擔任史丹佛大學哲學和中國語言教授，專長為倫理學、歷史哲學和中國思想史。他的著作除了本書之外還有下列各文：「共產道德與中國傳統」(Communist Ethics and Chinese Tradition)、「和坤和他的控訴者：十八世紀的意理以及政治行爲」(“Ho-shen and His Accusers: Ideolog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王陽明以來中國思想中的知行問題」(“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Chinese Thought Since Wang Yang-min”)等文。

倪著全書除前言與導論外共分十章，一、二、四章討論章氏的生平與經歷；三、五章則分別談章氏的校讎學與文學理論；六、七、八三章為全書的重心，討論道的觀念，史學思想與歷史著

述；第九章之內容爲章氏晚年的事蹟；第十章爲後人對章氏之評價及其影響。下面我們簡單地敘述各章的內容。

倪氏在前言之中首先說明他的研究動機，他認爲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長久以來似乎分裂爲兩個陣營，一部分人專注於傳統文化的研究，另外一部分人則探討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這種分裂使中國歷史變成沒有思想上相連貫的兩個獨立領域。倪氏希望能突破這種限制，兼顧上述的兩個部分。他發現章學誠的研究正符合這個要求，在時間上十八世紀屬於傳統時代，但在思想上章氏卻能不受傳統的限制而與現代接榫，因此他以章學誠作爲研究的主題。倪氏認爲過去對章學誠的研究多偏於方志學方面，部分人談及他的校讎學與文學批評，但還沒有人指出他在歷史哲學上的重要成就，因此他嘗試從這個角度來看章氏的思想。其次作者分別由政治、社會經濟和智識背景三方面觀察章氏生活的時代。在政治上，清廷的統治已十分穩固，對知識份子採取籠絡和高壓政策，而章氏似乎毫無保留地接受當時的政治權威。在經濟上，讀書人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當時士人謀生的方式有作官、擔任幕府、教書，以及參與官方的編纂計劃等等，上述的途徑除了作官之外章氏都曾經歷。由於缺乏固定的職業，章氏一生一直處於經濟困窘的狀態。在智識背景方面，當時官方提倡的爲朱熹之理學，而一般讀書人的興趣則在考證，章氏對於這些零碎的考證工作十分厭惡。以上是章氏所處的世界。他一直覺得自己不適合這個環境，但是讓我們感到興趣的是：章氏面對當時每一個人所面對的問題，思考當時每一個人所思考的觀念，然而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

第一章「背景與教育」，敘述一七三八年至一七七一年間章氏的生平，特別著重家世以及祖父、父親和朋友對他的影響。二十九歲時章氏與戴震第一次見面，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後遷居北京師事朱筠，協助編纂《續通典》，並認識好友汪輝祖。

第二章「成功」，敘述一七七一年至一七七八年章氏的生活，一七七一年章氏離開北京，至太平隨朱筠讀書，在此地認識了邵晉涵。這時他開始撰寫《文史通義》，又完成了第一部方志——《合州志》。一七七三年章氏與戴震二次會面，他對戴震的「原善」十分欣賞，但是在方志修纂方面兩人卻有不同的意見，戴以為方志只談地理就够了，章氏則以為方志是歷史的工作。後來雙方又見了一次面，兩人對鄭樵的《通志》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倪氏敏銳地指出：與戴震的會面為章學誠帶來很大的刺激，後來的一二十多年中，章氏的許多文章都在處理與戴震不同的論點。一七七八年章氏中進士，這時他在思想上已逐漸成型。

第三章「校讎學」，校讎學是指研究書籍的源流、分類，並探討書籍的真實性、完整性等問題的學問。一七七九年章氏寫成《校讎通義》，此書是從《合州志》之中發展出來，而《合州志》中的藝文書又仿自班固的「藝文志」與劉歆的《七略》。在《校讎通義》中他認為古代官與師合為一，至周代知與行分離，官不復為師，學術上才出現私家的著述。校讎的工作就是要分辨官師分離之後各種著述的源流。章氏的方法是採用「家」的觀念，將各種著述歸入某一家，再尋出其「家法」。家是一種歷史的實體，也是一種邏輯的分類。最後章氏提出兩個重要的建議：一、古代各種資料與文集都由官方收錄，後來私人著述漸多，官方收錄漸少，章氏建議恢復這種古老的傳統，把收集書籍當成政府的例行工作，這種工作的好處之一是可以查禁邪書，因此倪

氏認爲章氏的這個建議與文字獄的精神完全一致。二、建議將收集來的書依《佩文韻府》的編排方式加以分類，這種分類法與現代圖書館的分類方式類似。

第四章「書院中的老師」，敘述一七七七至一七八九年章氏在各書院中教學與著述的狀況。章氏前後在五所書院任教，這段時間經濟狀況較穩定。一七八七年他認識了學術界的名人畢沅，當時畢氏正從事《史籍考》的編輯，需要人手幫忙，章氏奮力自薦而爲任用。編輯時他認爲史學目錄中除了包括傳統認爲的歷史著作之外，還應包括經學、文集和哲學等著作，這種看法與章氏「六經皆史」的觀念有關。一七八九年他回到太平，在此地完成了二十三篇文章，計有「原道」、「原學」、「知難」、「感遇」、「博約」等文，章氏認爲這些文章是他一生之中的得意之作。

第五章「文與質」，文是指文章的形式（即作者如何表達），質是指文章的內容（即作者表達什麼）。此二者爲章氏文學理論的基礎，他認爲文學的目的是表達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只要具有深刻的思想與真摯的情感自然會產生適當的表達型式，所以他主張質先於文，文附於質。三代時官師治教合一，文與質亦合而爲一，至周朝末年舊的社會解體，文與質不復完全相合。在「詩教」一文中章氏認爲所有的著述都源於六藝，文學作品是源出於詩經，而文學中象徵的手法出於易經的傳統。

第六章「歷史與道」，倪文孫指出章氏所謂的道不是固定的、永恆的，而是在歷史之中逐漸呈現。這種觀念在錢穆與戴密微的文章中都已经提及，倪氏則將此命題發揮得更完全。他指出章氏在五十歲之前一直希望能將自己的思想連結爲一個系統，這個願望在一七八九年他寫成「原

道」一文後終於實現。在章氏的觀念裏「道」是在人類歷史中逐漸呈現，且與實際的事務、制度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它不是在歷史之外的永恆價值。三代以上治教合一，周公爲制作之聖王，是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而孔子有德卻無位，他爲了保存古代聖王之制作而編訂六經，這些經典是要人們在具體的事物之中了解道在過去的呈現。

第七章「史家的技藝」，一七九〇至一七九四年章氏住在武昌，此時期主要是思考史學方面的問題，寫成「答客問」、「釋道」、「史德」、「方志立三書議」等文。又完成了《亳州志》一書，此書有三大創新：一爲增加掌故，依六部的分類保存地方政府的有關史料；一爲附上人物表，仿班固的體例記載人物，但是並不加以評價。其次討論章氏「六經皆史」的觀念，一般多認爲它的意思是說把經典當成史料，但實際上章氏不是從方法的角度而是從哲學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六經是古代的政典，記載當時具體的事物，這些具體事物之中呈現出道在古代的進程。歷史源出於經典，故歷史也一樣地呈現「道」。此外章氏參加《續通鑑》的編纂工作，亦完成《湖北通志》，後者尤爲成功，記載了許多珍貴的資料，梁啓超認爲此書是中國最好的一部方志。

第八章「歷史哲學」，處理章氏史學中之意義與價值的問題。首先討論史學的發展，章氏以爲它與歷史著作的型式有密切的關係。三代以上收集資料有固定的方法，而歷史著作並無固定的型式；三代以後則剛好相反，歷史著作有固定的型式而收集資料則無固定的方法。當史著有固定的型式則成書很容易，成書很容易的結果是「文勝於質」（型式勝於內容），因此史學體例的固定最後卻摧毀了史學的創造性。正史型式的固定即爲最好的例子。由此可見章氏對史學史的看法與他對純文學的觀念一致：史學的形式應依內容而定，不應爲形式所限制。此外史著應求通，通

是一種全盤地了解，綱紀天人，推明大道，絕非史料收集上的完全。而章氏史學最重要的目的是追尋「史意」，作者認為章氏的史意含有道德的意義。最後對於優秀史家，章氏在劉知幾所謂的才、學、識之外，加上「史德」，即史家之心術，作為重要的條件。

第九章「最後的辯論」，敘述章氏晚年的生活，其中與汪中、袁枚的辯論最有名，關於辯論的內容胡適所著之年譜早已有詳細的敘述，作者則注意到原因的分析。例如他認為章、袁不和的原因一方面與章氏嫉妒袁枚的心理有關，袁枚是一個成功的人，而章氏的境遇卻一直不如意；另外則牽涉道德因素，章氏認為袁枚是一個無恥的諂媚者。一七九九年嘉慶皇帝親政，賜死和坤，整頓政治，一時人心頗為振奮，此時章氏數度上書討論時政，他認為國家敗壞的根源是道德問題。此後二年章氏貧病交迫，寫成了《文史通義》中最後一篇文章「浙東學術」。一八〇一年十一月章氏去世。

第十章「遲來的讚美」，討論章氏一生的成就及其思想對後代的影響。從十九世紀初期的觀點來看章氏的一生並不成功，當時的學術界對他不感興趣，而章氏對這種評價也不在乎。到他死了以後，才逐漸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史籍考》一書頗受一些考證學者的喜好，方志的編纂對後世有很大的啟發，更重要的是章氏對十九世紀的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章氏對十九世紀學者的影響，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已有很好的分析，他指出龔自珍與章學誠在思想脈絡上的延續性，倪氏則進一步的討論到今文學家廖平、康有為和古文學家章炳麟與章學誠在思想上的關連，而且談到後來的顧詒剛、馮友蘭亦曾受到章氏的影響。最後作者從西方歷史哲學的兩大派別：玄想的歷史哲學與批評的歷史哲學來看章氏的思想，玄想的歷史哲學意指注重歷史事



件在整個發展過程中的意義，以及歷史發展的歸趨；批評的歷史哲學則注意歷史知識本身，探索如何才能確定所發生過的事實爲真實不虛。作者認爲章氏所問的問題多爲玄想的歷史哲學的問題。

倪著之中有不少值得注意之處，首先就整體結構而言，全文統貫在章氏對古代文化史的見解之中，作者指出章氏將三代時官師合一、治教不分的社會視爲最高的理想，而這個理想的崩壞對各方面都造成深遠地影響。由於主張官師合一，所以認爲六經是古代的政典，因此學爲實用並非空言，而產生了重視實際的經世精神；同時官師合一亦代表政統與道統的結合，政統應該掌握道統，因此在政治方面主張「貴時王之制度」，帶有尊重現實政治權威的意味，這種觀念又與章氏不反對文字獄以及主張官方主動查緝禁書的提議連在一起，上述的各種看法彼此之間環環相扣不可分割。官師合一的理想破壞之後，在文學方面的影響是私家著述的出現，從文質合一到文質分離；在校讎學方面則因官師分離而產生各家流派。上述的看法作者雖然沒有直說出，但是讀者在閱讀之後卻會感受到這種內在的連繫，全書環繞此點而展開敘述不但觸類而旁通，更使全文凝聚緊密，極有意義的是這一特點亦正是章氏思想的核心。其次在章節的安排上，作者將「生平」與「思想」兩部分十分融洽地結合在一起，以生平的階段當作發展的軸心，順此而說明各時期思想的特色，而各階段的劃分也是作者在深入了解章學誠之後而設計出來的，這種安排無疑地比編年式的年譜更能讓讀者了解章氏的一生。

在內容方面，倪著綜合了前人對章學誠的研究，並進一步地從事分析的工作，如上述「道」、

「六經皆史」等觀念都是很好的例子。在生平方面也是如此，我們將胡適所著的年譜與本書稍加對照即可發現作者用心之處。例如一七八七年章氏前往北京，在吏部投牒，希望能取得官職，胡著年譜記載：「冬間，已垂得知縣矣，忽決計捨去」，倪著則進一步地推測當時章學誠的心理和思想狀況，解釋如何他在即將獲得官職時卻決定放棄。

在方法方面最特殊的是作者由於深入了解西方歷史哲學的傳統，因此往往利用對照比較的方法呈現章氏思想的特色。這種方法在中國人研究章學誠的文章中並不多見，但是法國學者戴密微則已經注意到這一點，他曾將章氏與韋柯（Vico）對比。倪著之中提及的西方史學家和哲學家除了韋柯之外還有黑格耳（Hegel）、柯林吾（Collingwood）等人，在第十章作著又以玄想的歷史哲學和批評的歷史哲學來看章氏思想，上述各項都是作者運用比較方法的例子。這種方法的長處是分析較敏銳，尤其可以顯示出不同文化間對問題看法的同異，短處則為會陷於從西方歷史的觀念來看中國思想，不易深入中國思想本身的脈絡之中。大致而言倪著中比較方法的應用並無不當。

此書亦有一些個人覺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在結構上本書有些章下分細目，有些章則渾然一體，體例上並不一致。誠然章學誠主張文章的形式應隨內容而定，不應拘執，但若能夠適度地加入細目可使讀者更容易掌握全書的內容。此外本書沒有「結論」，作者可能希望以第十章代結論，但兩者似乎不完全相等，若能再加入結論一章，綜合討論章氏生平與思想，並以古代文化史的觀念貫穿其中，則讀者能在分章分析之後再得到一完整的印象。

本書的另一缺陷是沒有中英文對照表，使讀者在閱讀時產生了一些困擾，而書目部分亦不完

全，希望再版時能補充改正。

最後我們嘗試從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回觀倪氏的著作，首先余書扣緊了宋明以來儒家思想中知識主義的興起來看章學誠的地位，使讀者對背後思潮的推演有清晰地了解；相對而言倪書似乎只就章學誠本身思想系統來探討，沒有掌握到在此背後思想上的脈絡發展，我們只了解章學誠本身，卻不了解宋代以來儒家思想大趨勢之下章氏的角色。當然，從此觀點來批評倪著是不公平的，但是卻可以呈現出這本書成就上的限制。其次余書之中曾對倪著作了一些修正：

- (1) 章學誠與戴震第一次見面時介紹人爲鄭誠齋而非朱筠。
- (2) 章氏參加科舉考試的次數，倪氏認爲是六次鄉試、一次會試，余氏則詳考清代制度斷定仍爲「七應鄉試」。
- (3) 倪氏懷疑章學誠屬於浙東學派，並舉出數項理由證明其論點，余氏認爲浙東學派不應視爲組織嚴密而延續不斷的「學派」，它只是指大體上具有共同的治學精神，倪氏上述的駁論有無的放矢之嫌。以上是余英時對倪著所作的修正。然而我們也發現他受到倪著不少的啓發，例如倪氏已經注意到戴震對章學誠的影響，並指出章氏的著作是針對著戴震而寫；其次倪氏斷定「實齋對浙東學派的自我認同是一種晚年追認之論」，余氏雖然認爲是「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但亦承認「這是一個富於啓示性的說法」。

總之，從學術史的演變來看，二十世紀以來對章學誠的研究有三個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是胡適、姚名達的《章實齋先生年譜》；第二次是倪文孫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第三次是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這三部書一次較一次深入，一本較一本精采。就倪著而言，它一方面總結了胡適、姚名達、錢穆、侯外廬、戴密微以來的研究成果，另外一方面亦爲余著的出現提供

助力，到目前為止它仍是全面性地掌握章氏生平與思想的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本書，我們相信未來任何對章學誠的研究都必須站在它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清楚。